



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



中国伊

丁士仁 / 主编

ZHONGGUO
YISILAN
JINGTANG JIAOYU

(上)

伊斯兰经堂教育

中国的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专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经典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信仰的宗教专业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收集了先贤和老中青学者论述经堂教育的三十多篇文章，梳理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发生、发展、传承和创新的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和一个厚重的伊斯兰文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 上 / 丁士仁主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12(2014. 3 重印)
ISBN 978-7-226-04523-7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伊斯兰教—宗教教育—中
国—文集 IV. ①B9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415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马晓燕
封面设计: 马吉庆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 上

丁士仁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396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001~4 000 册

ISBN 978-7-226-04523-7 定价: 40.00 元

序言

金秋的金城，色彩斑斓，硕果累累，令人赏心悦目感恩无限。我们与世界穆斯林刚刚一同欢度过1432年斋月和开斋节，中华各民族又迎来辛卯年中秋月圆。人生真是辛苦伴随着幸福，闲暇连接着忙碌，劳动换取来成果，成果带来了享受。我刚从外地回兰，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丁士仁教授便来看望，把溢有墨香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书稿送交阅读，随手翻开空白的扉页，指着“**序言喇敏智**”几个字布置了“作业”。没过几天因事又遇面时，他便问书稿看了没有？“作业”做了没有？他年富力强，性子较急，治学严谨，惜时如金，真是想法多多，行动速速。我不好怠慢，便抓紧翻阅的同时，询问了这部书的其他细节。

丁士仁教授介绍说，这部已经编纂完毕正在终审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拟分上中下三卷本。上卷是理论卷，收集了先贤和老中青学者论述中国经堂教育的三十多篇文章，包括了士仁本人四篇研究论文及附录资料；中卷是脉络卷，即梳理中国经堂教育发生、发展、传承、创新的历史轨迹、发展脉络、学术流派、重点地区和重大事件；下卷是传记卷，即给那些几百年来尤其是近现代在各地清真寺坊默默无闻地献身经堂教育，不做著述，不留墨迹，不图名利，育人、育德、育心，宣教、授知、启智，桃李满天下，教民皆受益，民间有口皆碑的经学大师们（他们或已顺命归真，或已耄耋之年）撰写人物小传，以翔实资料为其树碑立传，以缅怀前人，激励后学，垂范来者，业绩永续，传承正教。

我听后觉得这部书该出版，并预祝编纂成功，早日付梓发行，以助在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能形成专门的经堂教育学科。祈求安拉护佑默助！

（一）

经堂教育是伴随着穆圣传播伊斯兰教而面世的，是伊斯兰真理传承于世和教门

人才培养成长的重要教育形式。在当代中国是体制外的民间宗教文化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因为传播它的阵地是清真寺坊，教材是经典，师资是阿訇，费用是民助，因而叫做经堂教育。其溯源、其地位、其特点、其作用、其价值、其经验、其局限、其发展趋势、其革新传承等等，先贤们、学者们已多有鸿篇高论，我再说不出来更要紧更有用更有创见的話。只不过借“序言”，说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与大家沟通。

1. 有些中国文化人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说，社会发展到 21 世纪，“科技时代”、“网络时代”、“多元文化时代”、“知识爆炸的现代化时代”，人们探太空奔月球都成家常便饭了，伊斯兰教还有光辉吗？中世纪的经堂教育还有必要存在吗？还管用吗？有些穆斯林也有错误的抱怨：“落后的”经堂教育制度，“保守的”、知识结构不健全的阿訇们（指许多老阿訇排斥或自身缺乏中文教育），使中国伊斯兰变得封闭、保守、排他、神秘，广大教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教门被少数人掌握，满拉们成了念苏勒、念赞词、吃油香的专业户，连谋生的一技之长都没有，进入社会是弱势群体，民族的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振兴伊斯兰？怎么能展示伊斯兰各民族的新形象？在我看来，愈是现代化，愈是科学技术发达，愈加显示《古兰经》是永恒真理，伊斯兰是天启的正教。这是任何权威或社会力量无法否认，任何个人毋庸置疑的客观规律，是真理的定律！经堂教育仍然是传承伊斯兰、培育穆斯林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这也是毋庸置疑、无需动摇的。不过，面对新时代、新变化、新人群，经堂教育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采用新办法，走出新路子，创出新经验。简言之，必须坚持，应该自信；必须改进，应该创新。

2. 从事经堂教育的经师们、清真寺坊的阿訇们和关心教门、关心民族素质的善人们（包括出钱出力出智的各类志士仁人），应当常常看看本坊“哲玛提”的经堂教育和群众性学习氛围是蓬勃向上、稳健发展的，还是年复一年抱残守缺，教无良方、门庭冷落、萎缩潦倒？看看本坊“哲玛提”是充满生机活力，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入寺礼拜、学习、联谊，阿訇忙得不可开交，还是一些老人支撑门面，阿訇无所事事，寺管会捉襟见肘，寺里入不敷出？依我之见，先看看自己，再学学别人，从抓教育、强素质、出人才、树形象入手，多想想好办法，多选些好教材，多聘些好老师，多招些好满拉，多办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班级，多做些提高穆民素质的事，多传授些伊斯兰的真学问，使清真寺的功能全方位发挥，把国家宪法、法律、政策容许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做活、做实、做到位。其实，许多地方清真寺坊、拱北道

堂正在做以教育兴教门，以信仰促道德的许多有益的尝试，用光辉的实践在解除人们相互间的误解，在回答着教内外人们的质疑、诘问和责难。

3. 对接受经堂教育的学生们、满拉们的几句叮咛。你们出生在穆斯林之家（或非穆斯林自愿选择了伊斯兰信仰的朋友），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年代，由于受历史传统和自然地理、家境贫寒和自己厌学等因素的影响，在接受了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有些甚至是半文盲）或中途辍学后由家长送入寺门，交给阿訇念经学教门，巩固信仰，熏陶道德，懂得人生。当代社会无论城乡，发展迅速，手机、网络、影视、电子图书、报纸杂志，这“吧”那“吧”，令你头晕目眩，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中的非伊斯兰、反伊斯兰的侵袭防不胜防，清真寺也并不在“真空”里，阿訇、老师们也不是整天盯着你们的“警察”，希望你们自爱自重自省自警，谨防来自恶魔和社会上不健康思想的毒害，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力行实践。必须懂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教门能规范人生的道理，不要浮躁，不要焦虑，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见异思迁，不要荒废时日，不要辜负师恩，不要让父母亲人失望，不要枉食教民们对你们的供养，静下心来，真心实意学，努力使自己用民间教育、清真寺培养这条路成人成才，成为合格的中国穆斯林，走向社会后应当是个有益社会，有益他人，报效祖国，也造福自己，为民族为家乡为自己的亲人增光添彩的人。

最后，还要说到《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主编丁士仁教授。丁士仁教授经名安优布，出生于甘肃南部极为贫瘠而又充满商贸活力的临潭县穆斯林世家，他的长辈早就举意要把他“供成念经人，献身伊斯兰”。他幼年聪慧好学，自小接受中国文化国民教育和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双重教育，在临夏八坊铁家寺等多个寺坊受经堂教育，继又在改革开放初期与许多有志的年轻人同赴巴基斯坦求学十七载，中文、阿文、英文、乌尔都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化功底扎实，获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与学友们选择西部大开发中的教育领域，决心沿着穆圣和先贤们的足迹，坚实迈步并着力拓宽中伊两种文明有机结合的路子。供职于兰州大学后，积极争取、倡导设立了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第一项研究课题就是中国经堂教育。此后，团结了和联系着一批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有虔诚的乜提，有谦虚的精神，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亦有宽阔的胸怀、高远的眼光和求真务实作风的中青年学者、伊玛目和各方面的智者、善人，紧扣中阿融合，紧扣多种文明互动交流，紧扣爱国爱教、团结包容、教育兴族、博爱万物、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不断弹奏出一曲曲发人深省、沁人心脾、悦耳动听的和平之音、正义之曲、和谐之歌，引来穆斯林大众支持、鼓励、帮助和更深的期待。他对经堂教育情有独钟，下功夫研究，

尤其是两次成功举办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研讨会，和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研读、讲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遨游哈佛丰富的图书馆后，使他有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思想境界。我是他们这批中青年学者的一名老学生，或者说是忘年交的朋友。

我常常想，中国穆斯林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教派、不分学派，摒弃门户之见，团结起来，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再由学者带动，人人觉醒，大家凝聚，众志成城，珍惜千载难逢的机遇，迎接百年不遇的挑战，在这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里，阐释正教，回归经训，强化诚信，淡化教派，团结包容，中正不偏，爱国爱教，和美与共，弘扬伊斯兰真精神，展示穆斯林新形象，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伊斯兰和平传承，为全世界和平和谐和睦作出中国穆斯林应有的贡献，该多好啊！祈求真主援助我们！

舒尔布·喇敏智

2011年10月1日

目 录 | CONTENTS

绪论 (中国经堂教育溯源) 丁士仁 (001)

历史溯源

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 王静斋 (017)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形成、发展及特点 赛生发 (031)

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学说化 李兴华 (036)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回顾与展望 张志华 (050)

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及其影响 任 红 (067)

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及其历史贡献 丁 俊 (074)

试论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及其流变 丁克家 余 葶 (081)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回族经堂教育

——回族经堂教育与阿拉伯—伊斯兰教育的比较研究 张学强 (089)

新疆哈萨克族中的伊斯兰经堂教育 房若愚 葛丰交 (099)

学科制度

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 王静斋 (111)

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 庞士谦 (116)

中国伊斯兰教中的经学 李兴华 (121)

经堂教育中阿拉伯语语法教学与研究 张志忠 (130)

中国经堂阿拉伯语翻译技巧 丁士仁 (139)

经堂语言

经堂用语研究 希拉伦丁 (151)

回族经堂语的语言问题 杨占武 (162)

经堂语与元明“汉儿言语”相似的几种语法特征 杨占武 (173)

回族经堂语造词法浅探

——以普慈特慈与大慈大悲为观察点 马辉芬 (180)

“经堂语”的基本特征和关键语气 丁士仁 (184)

传播发展

清代云南穆斯林对伊斯兰学问的教学与研究 纳忠 (195)

金陵学派产生背景、思想渊源及当代意义 米寿江 (201)

青海回族撒拉族经堂教育 喇秉德 (209)

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 丁士仁 (214)

经堂教育的几大流派及其特点 申海平 (224)

回族经堂教育教材的当代变迁

——以宁夏西吉、海原、同心为例 马燕 (231)

调查思考

经堂教育的历史贡献、存在问题及改革意见 敏敬 (247)

女学: 经堂教育的拓展与文化传承角色重心的位移

——以兰州、西安、临夏调查为个案 杨文炯 (255)

试论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经堂教育的田野与思考 王平 (266)

民国穆斯林精英与经堂教育改良思想 马景 (276)

宁南山区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以同心县韦州镇为例 杨文笔 (289)

从经堂教育看回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 李晓英 (303)

回族经堂教育在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及挑战

——以云南巍山县永建镇为例 张立敏 (309)

附录

五十年求学自述 王静斋 (317)

《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 冯增烈 (325)

经堂课本比较图 丁士仁 (331)

绪 论

中国经堂教育溯源

丁士仁

中国的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专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经典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信仰的宗教专业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 20 世纪中国国民新式教育发展以来，穆斯林的教育模式和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体制也不断地改进，传统的经堂教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式微，出现了经堂寥落、寺院寂寞的局面。但是，经堂教育迄今还是中国穆斯林培养宗教专业人员的主要途径，始终是穆斯林教育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因此，经堂教育问题，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人难以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经堂教育命运的不断反思，以及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认识，经堂教育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被提上了研究议程，特别是对各地经堂教育的传承及传承者的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当然避免不了研究中国经堂教育的源头问题。以往的研究，一提到经堂教育，自然想到的是回族的经堂教育，很少联想到新疆的经堂教育，更不会考虑国外的经堂教育。然而，如果我们把经堂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把它跟国内外经堂教育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回族经堂教育只不过是一个流，其源头在新疆，而中国经堂教育（新疆和内地）的源头近在印度，远在中亚。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经堂教育资料的比较研究，梳理经堂教育的脉络，廓清回族经堂教育及中国经堂教育的源和流。^①

^① My special thanks are due to my classmate Jeff Eden, Ph.D stu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for his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to provide me with information about Madrasa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Asia.

经堂教育的发展

经堂教育不是中国穆斯林的首创，在国外早已有之，它是穆斯林世界传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国外，经堂教育素来分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经堂小学叫“麦克泰卜”，经堂大学叫“麦迪热赛”。小学教育以教授儿童识字和阅读、灌输基本的伊斯兰信仰为宗旨，大学则上升到了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人文学科，如教授古兰学、圣训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科目，甚至开设自然科学。小学教育模式在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迁徙到麦迪纳之初就形成了雏形，先知到麦迪纳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清真寺，作为穆斯林聚会和商讨大事的中心，同时也是宣传和学习的学堂。起初，先知亲自教授，当时不仅有成年男女在闲暇时去听讲和学习，而且还有一批固定的学员，那就是“凉棚的居民”（无家可归，在先知清真寺搭凉棚居住的人）。十八个月后，白德尔战役胜利，战俘中有文化的人，先知不让他们缴纳赎金，只要教授十名穆斯林儿童读书写字就可赎身。这样，先知清真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堂。不久，麦迪纳有了九座清真寺，每座清真寺仿效先知清真寺开设基础教育。^①这种教育模式逐步推行开来，普及到后来修建的所有清真寺。随着伊斯兰在东西方各地的传播，这样以清真寺为依托的教育模式在凡有穆斯林的地方盛行开来。实际上，在现代国家教育体制形成以前，经堂教育其实就是穆斯林地区的初级国民教育。它虽然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教育机制，或者是宗教团体创办的文化机构，但它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他支持，甚至有些学校就是官方办的，或者官员以个人的名义办的。时至今日，穆斯林国家的许多地方，儿童的启蒙教育仍然由经堂来承担，而且，在非穆斯林国家，经堂教育成了伊斯兰的启蒙教育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因为国民教育提供不了宗教启蒙所需的知识。

至于经堂大学，则是在小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高等教育，其职能不再是教授读书识字的基础教育，也不局限于培养宗教专业人员，而是肩负了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的职责，包括官员、数学家、医生、法官、建筑师等高级人才。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延续，即有些小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逐步变成大学，而有些大学，由于有了小学的基础，在创办之初就是大学的设置。中世纪著名的大学，在北

^①见 Prof. M. Hamiddin Khan, *History of Muslim Education*, (Karachi: Qureish Art Press, 1967), P.21.

非有依托格尔温伊清真大寺发展起来的格尔温伊大学（约公元 670 年创办），依托宰桐清真大寺发展起来的宰桐大学（公元 703 年创办）；在安达卢西亚，有依托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发展起来的科尔多瓦大学（790 年创办），还有，至今还在发挥重要影响的依托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建立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972 年创办）。另外，有些地方还独立的创办大学，如巴格达的智慧宫（830 年建立）和塞尔柱王朝大臣尼扎姆（1018—1092）在巴格达建立的尼扎姆大学（1067 年创办）。尼扎姆同时还在中亚和呼罗珊地区建立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几十所尼扎姆经堂大学。这些大学不仅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格尔温伊大学比欧洲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1167 年）早 500 多年，爱资哈尔大学也比牛津大学早 200 年。这些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只教授基础知识，只有一两名教员的学堂了，而是拥有上千甚至数千学生^①，开设几十门课程，文理并授的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里顿（1332—1406）对 14 世纪穆斯林地区经堂课程进行了统计^②，其中社会科学有七门：天文、医学、数学、建筑、逻辑学、音乐、哲学，而宗教学科只有五门：古兰学、圣训学、法学、教义学和苏非修行学。此外，有些经堂在伍麦耶王朝时期（661—750）就开设了冶金学（化学）和地理课程。^③由此可见，中世纪的穆斯林经堂大学不仅科目齐全、理论高深，而且实用性强、现实功能显著。伊斯兰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医生、历史学家无一不是从这种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

中国经堂教育

在中国，由于伊斯兰传入的时间和方式不一样，经堂教育的形成过程也不尽一致，主要表现在新疆和内地经堂教育的起步过程。在内地，经堂小学教育始于唐朝的“蕃学”。当时，移民到中国的穆斯林亟需解决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和信仰传承问题，很自然地就将原来母国的宗教教育模式移植过来。唐宋时期的“蕃学”有两

^①十八世纪末期，仅布哈拉一个城市就有来自各地的学生三万多人学习，见：Peter Malcolm Hol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Vol. 2, Part. 1, p. 479.

^②见 Rashid Ahmad, *An Overview of the Curriculum of Religious Seminaries of Pakistan With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2010 EABA & ETLIC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224.

^③见 Prof. M. Hamiuddin Khan, *History of Muslim Education*, (Karachi: Qureishi Art Press, 1967), p. 137.

种，一种是官办的，或官方支持的，另一种是纯民办的，私立的。无论官办的“蕃学”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或外交官员，或为其他目的，但私立的“蕃学”肯定就是学习宗教基础知识的机构。因此可以推想，私立的“蕃学”就是内地经堂小学的雏形，后来各地的经堂小学就是“蕃学”的推广和延续，也是穆斯林国家“麦克泰卜”的移植。至于经堂大学教育，在内地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高等教育。经过唐宋元三个朝代的发展，内地穆斯林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穆斯林群体出现在了中国大地。穆斯林的主体成了稳定生活在内地，操汉语的回回民族，而不是游动不定、往来中外的商客和军人；新的民族由于语言的变化，对祖先的文化产生了隔膜甚至无知。在这样新的形势下，对教育体制也有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小学教育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于是，在明朝内地出现了讲授高深伊斯兰理论的大学。而在中国新疆，情况就不一样，新疆的伊斯兰化和大学教育是同时进行的。公元91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955年卒）登上了喀喇汗王朝（840—1212）汗位，他不仅自己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在新疆还推行伊斯兰，为了加快伊斯兰化的进程，他仿照中亚经堂大学在喀什建立了新疆第一所经堂大学。“这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经学院”^①，其规模之大，学科之齐全，堪与中亚最好的大学相媲美。后来，像“罕里克学院”、“马赫茂德耶学院”、“米尔扎·海答儿学院”、“沙克耶学院”等学院不断出现，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地方经堂学院的兴起。叶尔羌汗朝时期（1514—1680），仅在首府叶尔羌一地就有10余所经堂大学。^②也就是说，新疆经堂教育的起点是大学，小学是其附属部分，二者同时起步。

当新疆的经堂大学教育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时候，内地还没有正规的经堂大学教育。在明代，当内地穆斯林感到大学的必要时，新疆的教学体制已经非常成熟。于是，内地经师们把目光投向了新疆，从那里学习和借鉴。内地和新疆虽然相隔万里，但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这种借鉴是自然不过的事，加之“丝绸之路”的通畅，交流和影响是非常便利的。但确切证明这一关系，还得从二者的一致性说起。我们可利用的资料就是经堂使用的课本，它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化石”，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历史的线索。内地经堂的课本在20世纪的主要有“十三本”，如果我们把它与同时期新疆经堂课本拿来比较，会得出一个较客观的结论，

^①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②任红：《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及其影响》，《中国穆斯林》2009年第5期。

如下所示：^①

20 世纪初新疆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算尔夫·米尔》；【语法】《**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舍尔哈·舍姆欣耶》；【诵读学】《泰吉维德》；【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赫》；【经注】《**嘎蓑**》、《砍沙夫》、《泰夫西尔·凯比尔》；【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夏耶**》、《伟夏耶简编》、《**黑达耶**》；【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热什哈特》、《**麦克土布**》、《玛斯纳威》；【教法原理】《吾苏里·菲格罕》。

20 世纪初内地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语法】《**遭五**》、《米苏巴哈》、《麦拉哈》、《**满俩**》；【修辞】《**白亚尼**》；【经注】《哲俩莱尼》、《**嘎蓑**》；【圣训】《**米什卡特**》、《虎托布》、《艾尔白欧》；【教法】《**伟夏耶**》、《**黑达耶**》（参考书）；【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麦克土布**》、《蓝玛阿体》、《米尔萨德》。

通过以上对照（其中黑体字所标示为二者相同的课本），二者的相似性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课本都一致，附带的课本有所增减，这种一致性不会是偶然的。同时，我们还发现新疆的经堂课程仍然是伊斯兰世界大学的标准设置，学科繁多，与伊本·赫里顿列出的课目大致相当，而内地的大纲只采用了其一部分，有些课程在内地没有人员教授，就索性不开设，况且这些与宗教的关系不大，如数学、逻辑、哲学。二者的相似性被清朝中期的政府官员注意到了，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官员为掌握各地穆斯林的动向以防谋反，暗查各处清真寺的活动和所习之经，发现“内地回民所习之教，所讲之经，皆与喀什噶尔、叶儿羌等处回人经教无异”^②。因此，我们可以说，内地移植了新疆的教育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新疆经堂的教科书，还是内地的教科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所增减，即便不断变化还能达到如此的接近和一致，充分说明二者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之间的渊源了。那么是否会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呢，即新疆受到内地经堂教育的影响？毕竟上述相似性是 20 世纪比较。答案是否定的！这就要从上述课程的设置和大纲的来源说起。

^①德国东方学家哈特曼于 1904 年的调查报告，其中黑体字所标示为二者相同的课本。见〔日〕佐口透著，凌炳纯译：《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654 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 1208，二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

18 世纪后印度经堂教育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经堂教育，就以上述大纲中列出的课目和课本而言，实际是 18 世纪以来印度经堂教育的移植。公元 711 年，伍麦耶王朝年轻的大将穆罕默德·嘎西姆率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印度，很快就将信德和旁遮普置为哈里发的一个行省，并入伊拉克总督辖区。10 世纪中叶，阿富汗人在印度西北建立了葛兹尼王朝（961—1186），统治了北方的广大山区和辽阔平原，推行伊斯兰。1192 年，廓尔王朝（1151—1206）统治者穆罕默德·戈里（Muhammad Ghori）攻克印度德里，在印度建立了穆斯林政权。在穆斯林统治和居住的这些地区，清真寺和经堂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据有关资料显示，13 世纪，仅德里一地，经堂学校就有一千所。^①尽管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可见当时印度地区经堂教育的盛行。然而，印度规范的经堂教育是在莫卧儿王朝（1526—1859）建立后兴起的。阿克巴尔大帝（1556—1605 年在位）时期，帝国统一，权力集中，国库盈实，社会稳定，加上阿克巴尔本人热爱学术，提倡文化，鼓励教育。为了提高和规范教育，阿克巴尔大帝特邀著名经师番特洪拉·设拉兹（1589 年卒）从波斯来印度兴办教育。番特洪拉来印度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经典，其中一部分是呼罗珊和中亚地区当时流行的教科书。番特洪拉主管帝国的教育以后，开始修订教学大纲^②，确立课本，并在帝国境内推行。他的教学大纲在印度经堂中沿用了近两百年，几乎没有变动。18 世纪初，勒克瑙的尼扎姆学院脱颖而出，成了印度经堂教育的典范。校长经学大师孟俩·尼扎姆·丁·斐冉凯（约 1678—1748）在番特洪拉的大纲基础上制定的“尼扎姆大纲”风靡全印度，影响了印度全国的经堂教育，也传到了周边的地区。这一大纲的影响之大，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地的经堂仍在沿用，而且还叫“尼扎姆大纲”，尽管三百年来不断改进，但其框架和部分教科书一直未变。“尼扎姆大纲”流行以后，很快就传到了我国的新疆，并且很快就由新疆传到了内地。于是，就出现了新疆和内地

^① 见 S.M.Azizudin Husain, Edited, *Madras Education in India* (New Delhi: Kanishk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2005), p.55.

^② 他制定的大纲和教科书，基本反映在后来的“尼扎姆大纲”中，见 Prof. M. Hamiuddin Khan, *History of Muslim Education*, (Karachi: Qureishi Art Press, 1967), pp. 134—135. Also see Sayyid Mahboob Rizv, *History of Dar al-Ulum Deoband* (Published by Dar al-Ulum Deoband, India, 1981), pp.197—198.

经堂教学大纲雷同或一致的情形，而且传入的路线是先新疆后内地，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看看印度经学大师孟俩·尼扎姆于 18 世纪初制定的“尼扎姆大纲”，把它与我国新疆经堂大纲进行比较（内地经堂大纲只是新疆经堂大纲的浓缩），会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其渊源关系。

20 世纪初新疆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算尔夫·米尔》；【语法】《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舍尔哈·舍姆欣耶》；【诵读学】《泰吉维德》；【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赫》；【经注】《嘎蕞》、《砍沙夫》、《泰夫西尔·凯比尔》；【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夏耶》、《伟夏耶简编》、《黑达耶》；【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热什哈特》、《麦克土布》、《玛斯纳威》；【教法原理】《吾苏里·菲格罕》。

《尼扎姆大纲》课本：

【词法】《连五本》、《黑达耶·纳合吾》、《米赞》《麦沙阿卜》、《算尔夫·米尔》、《祖卜戴》、《福苏素·阿克百尔》、《沙菲耶》；【语法】《卡菲耶》、《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苏力塔尼·奥露米》、《瑞萨莱·米尔》、《孟拉·结里里》、《苏胡拉》、《库卜拉》、《伊萨胡吉》、《泰海宰卜》、《舍尔哈·泰海宰卜》、《古图卜》；【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天文】《泰什瑞哈》、《瑞萨莱·古什吉亚》、《瑞萨莱·恰合敏》；【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赫》；【经注】《哲俩莱尼》、《嘎蕞》；【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夏耶》、《黑达耶》；【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舍尔哈·麦瓦给夫》、《舍尔哈·结里利》、《米尔扎黑德》；【教法原理】《奴如里·艾奈瓦尔》、《讨蕞哈》、《穆散里姆》。（黑体字标出者为双方共同课本）

经此对照，我们又发觉了类似于新疆和内地大纲之间移植关系的再现，即新疆的经堂教育几乎是全盘从印度端过来的，无论课目还是课本都移植了印度的大纲，只是课本上有所浓缩。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原来中国经堂教育与伊斯兰世界的教育联系如此紧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堂教育是受到印度经堂教育影响这一事实。因为没有类似的大纲从阿拉伯或别的地区传来，而且印度自古与我国新疆联系非常紧密，交流频繁。中国的经堂教育受印度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是，16 世纪印度学者写的两本著作在中国，特别是在西部很流行。一本是伊玛目·冉巴尼（艾哈麦德·希尔恒迪 1564—1624）的《书信集》，是 20 世纪西北经堂中的主要课本之一。

另一本是制定《尼扎姆大纲》的尼扎姆·丁的父亲孟俩·古图本·丁（1691年卒）应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1618—1707）之邀编辑的教法大全，叫《番塔瓦·恒迪》，或叫《阿莱姆给尔教法大全》，这是西北经堂中普遍参考的教法经典，而且直接与《尼扎姆大纲》有关。这两本经典在内地经堂中的出现，毫无含糊地表明，印度经堂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里，我们可以说：18世纪以后，中国经堂教育受了印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到20世纪，或者至今，中国经堂教育保留着印度经堂教育的影响，中国现代经堂教育的源头在印度。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尼扎姆大纲”产生于18世纪初，而中国新疆在10世纪已经有了经堂教育，就连较晚的内地经堂教育，也是在16世纪形成的，在“尼扎姆大纲”以前中国经堂教育会是怎样的，是否就是土生土长的呢？中国经堂教育，无论内地还是新疆，在18世纪以前主要受中亚“河中地区”，特别是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影响。

18世纪以前中亚经堂教育对中国的影响

早在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就越过阿姆河，到过中亚的撒马尔罕地区。706年阿拉伯将领伊本·古太白率穆斯林大军征服河中地区，于709年征服了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于712年征服了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很快于715年将整个河中地区置于哈里发的版图。后来萨曼王朝（875—899）曾建都布哈拉，推行伊斯兰化，帖木儿帝国（1370—1405）建都撒马尔罕，发展文化教育，使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座历史名城成了中亚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学术的圣地，经堂教育的大本营，被誉为穆斯林世界的“璀璨的明珠”。来自印度、俄罗斯、新疆等地的学生在这里求学。^①蒙古人于1220年占领布哈拉以前，那里就有四百所学堂。^②18世纪末期，布哈拉就有来自各地的三万多学生学习。^③就连影响了中国的印度经堂教育，也是受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印度的伊斯兰主要是中亚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带过去

^①见 C.E.Bosworth, M.S.Asimov,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Jaideidra Prakash Atjai Press), Vol 2, p. 38.

^②见 C.E.Bosworth, M.S.Asimov,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Jaideidra Prakash Atjai Press), Vol 2, p. 38.

^③见:Peter Malcolm Hol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Vol. 2, Part. 1, p. 479.

的，经堂教育自然也是从中亚移植过去的。1220年，成吉思汗屠戮布哈拉，后荡平撒马尔罕，那里的经堂教育受到重创，部分学者和经师逃到了印度（蒙古人始终没有攻下印度），有力地推动了印度的经堂教育。16世纪初，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从撒马尔罕被乌兹别克人逐出，他率军征服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1526—1857），大批经师和学者被邀赴印度发展经堂教育。因而，印度的经堂教育从一开始就受中亚的影响，就连早期的学堂建筑形式和校园结构都是仿照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学校模式建筑的。^①不过，中亚的教学体制似乎比较松散，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规划，各学堂的大纲和课本不统一，始终没有形成像印度的“尼扎姆大纲”那样统一的体制，因而在印度的“尼扎姆大纲”流行以后，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亚的体制，这就是中国经堂教育在受中亚影响后，转向移植印度教学大纲的原因。18世纪以前的中亚经堂教育的大纲，在历史的变迁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从19世纪残存的课本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线索，以及它与“尼扎姆大纲”的联系。19世纪以后，中亚经堂中仍然教授下列课本：《算尔夫·米尔》、《满俩》、《舍尔哈·舍姆欣耶》、《哲俩莱尼》、《嘎菘》、《砍沙夫》、《奈赛斐信经》、《伟戛耶》、《黑达耶》、《讨菘哈》、《孟拉·结利里》、《泰海宰卜》、《奴如里·艾奈瓦尔》等^②，从中不难发现与“尼扎姆大纲”一致的课本，中亚经堂教育对印度即“尼扎姆大纲”的影响可见一斑。

至于中国，新疆与河中地区在地缘上的联系是无须赘述的，仅喀喇汗王朝（840—1212）和察合台汗国（1227—1369）就将它们在政治和文化上连在了一起，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10世纪初，新疆创办经堂大学教育时，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早已是经堂教育的中心，萨图克·汗和经学创办者们必然要借鉴那里成熟的教育体系。不仅如此，新疆的经堂中，经常聘请中亚布哈拉等地的学者授课，如11世纪中亚著名学者侯赛因·本·海拉弗长期在喀什的学堂教学。^③这就说明中亚对我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中国内地，自古跟中亚的联系就很紧密。成吉思汗的西征，将大批学者带到了

^①见 S.M.Azizudin Husain, Edited, *Madrass Education in India* (New Delhi: Kanishk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2005), pp.37—57.

^②见 Vital. V. Naumkin,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Pen and Rifl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 50. Also see: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 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30.

^③任红：《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及其影响》，《中国穆斯林》2009年第5期。